

高教前沿

2015年第8期

(总第13期)

南京邮电大学高教所主办

2016年6月22日

目 录

◎ 高校动态 ◎

未来五年, 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1
全球: 大学如何应对大学排名方法的变化?	4
“A类期刊”变更折射哪些问题	5
以生为本、以学习为中心, 协同推进建、用、管.....	7

◎ 高教视点 ◎

大学办学院还是“学院办大学”	9
双一流: 地方高校不应“置身事外”	11
培养“高情感”的大学生.....	13
大学有中国模式之说吗?	15
学生评教, 我们该如何看待	17



◎ 高校动态 ◎

未来五年，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6 高等教育版》的新发现

未来五年高等教育机构将会面临什么形势？有哪些趋势和技术将会驱动教育的变革？有哪些挑战是我们认为可以解决或难以克服的？我们如何制定有效的战略性解决方案？全球 58 位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和专题讨论，形成了《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6 高等教育版》。本报告由新媒体联盟与美国高校教育信息化协会学习促进会（ELI）合作完成，揭示了未来五年全球范围内影响高等教育变化的关键趋势和重要挑战。

近期影响趋势 未来 1-2 年内的高等教育变革

混合式学习日趋发展

过去几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和教育工作者将在线学习看作某些面授教学的补充形式，人们对在线学习的认识也日趋理性。混合式学习的优势很明显，其灵活、便于实现、能够整合复杂的多媒体和技术等特点都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高等教育机构正在获得更多数字化环境创新的筹码。人们普遍认为利用数字化环境提供新思想、新服务和新产品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生期望高等教育能够充分反映他们在互联网生活中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和与人沟通的即时性。高校也在不断增加在线课程的数量，以解决学费昂贵和学习机会缺少等普遍性问题，从而帮助学习者克服经济困难，平衡在家庭和工作中的责任。混合式学习融合了在线和面对面两种学习路径，为学习者提供了整合化的学习体验，并提供灵活的学习支持。这些融合的方法能同时促进独立学习和合作学习，并为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提供更多渠道。

在线工具的整合也让教师能够追踪学生的学习进程和参与程度，然后利用该数据信息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翻转课堂是一种混合学习模式，学生可以开展论坛讨论、进行问题解决，并且积极应用他们的新知识。另一种方式是将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与课堂教学和同伴互动相结合。

在实践中，许多高等教育机构都采用了在线学习和面授课程相结合的混合式创新课程设计，让学生从课程学习中受益。美国费城的皮尔斯学院所服务的学生群体主要由在职人士组成，学校引进了灵活的课程实施方式：学生每个星期都可以从面授或在线课程中选择一种方式。采用混合学习方式后，学生旷课率从 10.2% 减少到了 1.4%。

日益重视学习测量

学习测量是评价领域十分关注的新视角，强调教育工作者利用各种方法和工具开展评估、测



量，记录学术水平、学习进程、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对学生的其他考核指标。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正在重新定义职场中哪些技能是必要的，高等院校必须重新审视如何定义、测量并展示对学科知识的掌握。数据挖掘软件的激增、在线教育的发展、移动学习以及学习管理系统诸多要素正在共同引发学习环境的变化，在新的学习环境中能够利用学习分析和可视化软件，以多维度 and 可移植的方式分析学习数据。

有研究者和专业公司正在设计类似的分析工具，以发掘学习相关数据中所隐藏的可用于改善学习的模式，为学习者和教育机构提供精准服务。被分析的学生数据通常包含学生人口统计学特征、选课信息、学业进度、学习平台参与情况以及对概念的掌握。尽管很多试验正在进行过程中，但很多专家已经开始引导大家关注那些学习数据信息类型及数据使用所涉及的隐私和伦理问题。

新一代功能更强大的学习管理系统将会是以学习为中心的平台，核心功能包括个性化、分析、咨询、学习评价以及无障碍访问等。

大学领导者们也借助推广最佳实践的方式，来推动学习数据的使用和保护。其中的一项措施是预测分析报告框架，成员彼此分享学习者保持率和学习进度等数据，以确定自己学校在同行学校中的排名，并探索对促进学生成功项目投入的回报率。同时，信息科学、机器学习、情感计算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和算法进行持续调整，并且通过各种数据格式的评估和反馈来增强分析能力和洞察力。

中期影响趋势 未来 3-5 年内的高等教育变革

更加注重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日益深远。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对深度学习进行了界定，即学生通过批判性思考、问题解决、合作和自主学习，掌握学习内容。为了让学生始终保持学习动机，他们需要明白课程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需要了解新知识和技能对他们的影响。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挑战的学习、基于探究的学习和其他相似的方法有助于学生在校内外获得更多主动学习的经历。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拥有职场成功的技能，进而影响社会。美国大学和学院联合会最新一项研究显示，近期雇主们更重视毕业生在重要领域的能力储备，如批判性思维。

依据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说法，深度学习促使学生关注内容的意义、相关联的观点，并将其与先前经验联系起来，形成自己的理解。深度学习旨在引导学生摆脱机械学习，激发他们真正的好奇心，使他们乐意进一步探索。

大家普遍认为，基于项目的学习能够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和自主学习。在基于项目的学习中，核心概念或问题驱动学生针对明确的目标展开调研，形成有意义的知识建构。学习者策划任务、流程和产品，展示新知识，并在过程中展开深刻反思。

为了在全球高等教育中推进深度学习，大家需要了解的是，深度学习有助于帮助学生获得高质量学历认证。随着深度学习越来越多地付诸实践，这种趋势的影响将持续增长。美国宾州加利福尼



亚大学和戴尔玛学院的调查显示，学生深度学习的表现有明显增强；81% 的学生掌握了主题内容，91% 的学生在课程中展现了自己的毅力。

重新设计学习空间

教育环境的设计也开始注重支持基于项目的交互学习，特别注重在交互学习过程中凸显更强的移动性、灵活性和其他设备的使用。学校也纷纷采取升级无线网带宽的方式来创建“智慧教室”，支持网络会议和其他形式的远程协作交流。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已经倡行多年并开始深入人心，这让很多高等教育专家重新思考学习空间应该如何进行改造。创新学习空间的益处已被认可，扩展学习中心是一个为工程师设计的混合式学习空间，具备利于团队活动的更灵活的动态布局。这些重新设计的空间可以用来开展通常意义上的弹性学习或主动学习。有些人认为，这些新的学习环境特点就是，其设计能够实现协作和基于项目的学习，而随着支持学生建模和创作的设备的添置，这些学习环境会很快获得改进。

虽然目前的讨论仍然集中在重塑实体学习空间，但探究帮助在线学习的空间设计的时机已经成熟。例如，美国普渡大学创建了一个灵活的学习区域，为在校学生和远程学习的学生服务。利用吸音板和顶棚麦克风来收集无中断音频，灵活安排可移动的设备，为在校学生和远程学习的学生在工程课堂上提供更好的体验。实体和虚拟学习空间的整合，为混合式学习引入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和设计，世界各地的大学正在建设使用最先进技术的教室和空间，从而促进更健康环境中的协作。例如，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新建的学习创新中心的特点是“学生环绕式”课堂。该建筑中心的教室设计可以允许班级之间的流动，并且设置有非正式学习空间，学生和教师可以在课余时间协同学习。

长期影响趋势 未来 5 年或更多年内的高等教育变革

重新思考高等教育模式

高等教育领域中发生的变化正在颠覆大学的传统观念，改变着高等教育学习的范式。相关研究发现，21 世纪经济的需求和毕业生离校时能胜任的工作之间存在脱节。一些国家通过新的政策举措、项目和课程，鼓励学生与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同伴合作，创新性地解决复杂问题，努力让学生加深对工作的理解。这一趋势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探索教学模式和证书授予的可替代方法，以适应快速增长的学生数量及其多样化的需求。

当今数字世界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物理校园之外的学习机会，大学正在逐渐改革以适应世界的不断发展。英国牛津大学发布的《2015 年高等教育国际趋势》的调查结果强调，各国已经采取政策性措施，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以期通过博士生项目，培养工作领域的可迁移技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经济竞争力。

这些因素正在促成新型培养方案的发展，以通过跨学科活动实现意义深远的、持续性的变化。最近，中欧大学启动了主题知识项目，让不同的组织和部门参与其中，开拓跨学科产品。最近，该



大学正针对社会心理、社会公正与不公、能源和社会、管理四个主题，对所要开发的新课程、会议或工作坊征求教师们的建议。

许多大学正在积极打破学术孤岛，构建学者和问题解决者间的跨学科社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一个跨学科研究项目资助了一些合作研究项目，这些项目要至少涉及以下四个研究领域中的三个：脑疾病的发现与治疗，机器人、传感器和先进制造技术，前沿工业和环境保护，全球食品加工。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的学生可以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强化课程，汇集了生物学、地质学、通信和社会学，他们要为跨领域交流创建基准。

努力推动创新文化

研究型大学通常被视为发明和创新的孵化器，并直接影响本地社区甚至全球的发展。为了培育创新并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不断调整自身组织结构，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激励创新和创业。高等教育的研究者越来越认同，采用反应敏捷的创业模式能够让组织的领导力和课程体系受益。教育工作者们正借助这些模式开发新的方法和项目，驱动自上而下的变革，并能在很多组织情境中广泛实施。

当代职场对雇员的要求是机敏、适应性强、具有创造力，因此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正在改进现有的专业项目，创建培养这些关键技能的新项目。在当今大学里，近 25% 的大学生渴望成为企业家。随着这一趋势逐渐显现，其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欧盟委员会一项研究表明，与同龄人相比，参与创业项目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更快地获得工作，更有信心在工作领域创新和创业。创业教育联盟还认为，创业有利于改善学生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包括自我认知、自我管理和创造力等。

创新政策平台主张大学应该支持创业课程，吸引和容纳更多的学生，培养能够达到高质量教学标准的教师。项目中的教育工作者必须了解复杂的教学法，支持更多的互动学习；大学鼓励教职员工通过专业发展和参与创业的机会，获取创业技能。创新政策平台建议培训策略不能仅限于业务开发和管理，而要重视企业发展中的挑战及风险承担，并建立战略联盟。此外，教育机构应该制定政策来定期聘请行业人士成为客座讲师，以加强课程与真实世界的联系。

（作者：北京开放大学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项目组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 年 5 月 6 日）

全球：大学如何应对大学排名方法的变化？

随着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获得变得更加容易，大学排名也越来越细致和复杂，这些对排名方法的改变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可能的条件。面对排名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各方的批评意见，各大排名机构开始调整排名方法，但也在此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

2015 年年底，四大世界大学排名公布了他们对排名方法的调整和改变。QS 排名对五大主要学科领域的被引次数进行标准化，使其学术成果的被引次数具有相同的影响力。另外，QS 延长了部



分调查结果的有效时间，使得调查指标更稳定，并在部分学科（主要是物理学）中停止使用论文数作为衡量指标。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决定不再将超过一千名合作作者的论文及成果纳入统计范围。此外，该排名使用的数据库也从汤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 调整为斯高帕斯 (Scopus)。美国世界大学排名 (US News) 新增添书籍和引用率两个衡量指标。上海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也根据汤森路透数据库最新修订的名单对高被引科学家这一指标进行了相关调整。这些调整对不少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产生了影响，有些大学的排名有较大进步，也有大学则遭遇排名滑坡。

2016年2月，在世界大学排名方法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各大排名机构及国际学者专家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联邦大学 (Ural Federal University) 举办了一场高水平研讨会。会议就排名方法的变化对大学的影响以及排名机构的责任展开讨论。实际上，选择适合的标准和指标来衡量大学的表现本身就很有难度。再次，由于大学排名受到“观察者效应”的影响，大学往往会为在排行榜中取得较好的表现而采取相应措施刻意迎合某些排名指标。因此，大学排名的产生使得衡量大学表现这项工作变得愈加复杂。会议指出，大学排名方法的变化及其影响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大学要学会应对这些变化；另一方面，排名机构需要意识、承担排名所肩负的责任。对此，会议提出几项建议：首先，排名方法的变化和调整要公之于众，排名机构应该让大学提前有所准备并了解排名方法发生的变化；第二，排名方法的变化和调整应该循序渐进，不应大肆调整。否则，就不是对原来排名的延续，而是另立门户形成一种新的排名方法了。虽然排名方法的变化势在必行，但是变化仍要以公平、有序的方式进行。

(翻译：张宇晴，校对：姜雅萃 来源：《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2016年第64期)

“A类期刊”变更折射哪些问题

5月6日晚，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发出《关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补充事项的函》，向高校各学位授予单位说明：根据部分单位和学者提出的一些意见建议，经过对相关问题的审慎研究，学位中心决定，仍沿用上轮的评估方式，暂不增列“A类期刊”指标。另外，较多单位反映五月正值研究生答辩高峰时期，五月底前完成评估材料填报难度较大，学位中心决定将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16年6月20日。

“A类期刊”名单取消的前前后后

4月22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向高校发出《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邀请函》，然而公布一周之后，却在高校和学界引来质疑。

不同意见一方面来自高校科研等部门的人员。虽然邀请函上写着此次评估高校“自愿申请参评”，但“所有高校几乎不可能放弃申请，由于5月9日就要送交参评学科清单，5月30日之前必须提



交参评学科《简况表》《信息表》等材料，学校立刻紧锣密鼓准备。”一位高校科研处的人员说。然而，他们随后发现，“A类期刊”名单与之前在高校和学界进行学术评价时通用多年的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名单存在很大差异，这意味着要填好此次评估的表格，必须重新收集教师发表在“A类期刊”名单上的文章，最简单的程序也要经过教师上报、学校核实，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而这段时间正是高校毕业答辩的繁忙期，十几天时间很难完成。

与此同时，“A类期刊”名单上的期刊，引来更多教师的质疑。以教育学为例，“学术刊物的影响力和排名以前都做过，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很多期刊与这个名单上期刊差别不大，甚至排名还在前面，但却不在名单里。进入名单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列为教育学A刊的8种外文期刊都是比较教育类的，而教育管理、教育政策、教育经济类的发表成果怎么算呢？”一些学者向记者反映。全国政协委员何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高峻也通过各种方式，对“A类期刊”名单提出质疑：为何这个名单上中文期刊要比外文期刊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研究有自己的特色和气象，倚重在外文期刊上发表论文来评估科研成果不尽合理。

各方对“A类期刊”名单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名单上的外文期刊比中文期刊多；外文期刊选择不够科学；中文和外文期刊都存在覆盖面不够的问题，涉及的学科不齐全；一些权威期刊和高质量的学报不在名单上；CSSCI能较好地衡量学术水平，为何还要再列“A类期刊”名单；一些一级学科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这两个并列的一级学科放在一起等等。

据记者了解，上述意见和建议很快传递到教育主管部门，相关单位十分重视，研究决定发出《关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补充事项的函》及时回应。在这一函件中，除了申报截止时间延长、“A类期刊”名单取消，还有一条是“考虑到‘学位点动态调整’仅在四省市先行试点，2012—2015年新增列的学位点一般也还没有毕业生，现将‘参评条件’中‘2016年新增列学位点的学科，可不绑定参评’，放宽为‘2012年（含）以后新增列学位点的学科，可不绑定参评’。”

“A类期刊”名单取消留下的思考

“A类期刊”名单虽然已经取消，但在这个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值得思考。

“A类期刊”名单的出台，根据《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邀请函》附件《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及有关说明》所述，是要“建立更科学的‘中国版ESI高被引论文’和人文社会学科我国自主的‘A类期刊’评价体系，树立中国论文评价的国际地位。”很多高校和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奋斗目标。

客观地说，“A类期刊”名单出台也不是坊间所说“拍脑袋”想出来的。上述文件对有关“评估方法改进调研”进行了说明：“分别与汤森路透、中国知网、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等机构进行研讨，改进论文评价方法；面向全国万余名博导及有关学科评议组进行全面调研和投票，形成‘A类期刊’清单。”5月6日发布的函件又进一步说明，“‘A类期刊’遴选过程，是先由专业机构依据文献计量学方法，参考影响因子、声望指数等指标，经综合分析提出初选名单，再请专家学者对初选名单进行投票，并将投票结果提交学科评议专家审议，形成相应学科的‘A类期刊’清单。”



但这样形成的清单为何出台后仍受到质疑，最终被取消？

围绕学术评价，我们需要思考应该以论文本身进行评价，还是以其发表的载体即期刊来评价？“一篇论文的影响因子、转引率能说明其学术价值。如果能依论文本身来进行评价，每个高校只要列出在某学科 100 篇最好的论文就行。而列出一个名单，看它是在哪个期刊上发表，哪个出版社出版才算有价值，不公平也不科学，也是对学术评价的不当干涉。”教育学者李立国教授说，“认真思考学者的意见建议，对我国的学术构建，让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非常有意义”。

针对决策程序，需要思考我们一些常规决策是否仓促，缺乏与利益相关方广泛充分互动。“任何决策，除了决策本身要讨论，决策过程和讨论决策的规则也要讨论，前者是广泛征求意见，后者保证征求意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而且这些讨论都要公开透明地进行。拿这个名单来说，学位中心之前也做了大量调研和征求意见，但这一过程中高校和学院作为利益相关者，其以一对一的形式提交给中心的期刊名单总会倾向于自身利益，其选择是本位主义的，最终是通过正式的渠道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大家都不会满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柏英教授说。

显然，对“A类期刊”名单取消的讨论，如何让学术归于学术，让行政归于“放管服”，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王庆环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5月8日）

以生为本、以学习为中心，协同推进建、用、管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对我们今天的高等学校是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我把它作为生存条件来对待，就是说，一个学校如果没有网络，这个学校如同我们到了乡下没有电一样。信息技术确实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东西，同时这也是学校发展的宝贵资源。利用信息网络，利用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所以说，信息技术对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来说确实是太重要了。

当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信息化的重要，正如刚才张拥军处长所说，我们工作中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认真地从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工作，还会觉得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这集中体现在建、用、管三个方面的差距。

在建设问题上，硬件建设相对容易一些，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全覆盖，课件建设上真正符合学生学习需要的教学资源建设还很不够。我们确实建有不少数字化教学资源，但是真正适合学生，用新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来推进教学改革的课件不是很多。有不少课件，包括以前很多数字化教学资源库里面的东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课堂搬家，真正符合利用信息化手段，适合学生学习的那种课程还是不够多，真正体现以生为本、以学习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的课件还不多。

在用的方面，虽然在网放了一些课程，但是用起来的还是不够多。我刚才问北京大学建了多少，说有百门左右的课在网上，我也了解了清华大学，差不多也是百门左右，社会上也有百万人在



学习，但是真正完成学习的不超过 5%。很多学校里，学生真正在利用信息化手段，特别是 MOOC 那样的课程，采用大规模的线上教学和课下小班化辅导相结合、有效地使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教学质量的课程还不多，所占的比例也是微乎其微。这说明我们还是使用的不多，老师们也不见得都会用这些新的信息技术来进行教育教学的改革，真正用现代信息技术来进行互动、交互式教学并且能够用得好的老师还不多。所以对老师来说，今天要做到用好技术教好书，还有很多很多人没有做到，更不用说用好技术让学生学好。这又是一个层次的转变，以教学为主转到以学生学习为主，体现以学生为本、以学习为中心这样的理念。

在管理方面，如何让老师把课上、课下、同学大小班有机地组织好，这是个教学管理问题。学分互认也是在信息化条件下教学管理很重要的环节，这种制度今天很难说已经完全建立起来。学分互认，主要的还是学校和学校之间的相互承认，而不是指望国家哪天出台一个统一的学分标准，这是不大可能的，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做的，要鼓励的还是学校自己来认定哪些是可以承认的学分，这种教学管理在今天还是做得很不够。

因此，我们在讲建、用、管的时候，要贯穿以学生为本、以学习为中心的核心理念，按照这样的理念推进信息化应用。信息技术是学校有机的神经系统、神经中枢，依靠它可以建设起智慧校园。在智慧校园中，学生们智慧地进行学习，教师们智慧地进行科研，学校智慧地进行管理，学校对社会的服务也走入智慧化的服务。

此外还有一些方面有不足，比如说在安全管理上，可能还存在着许多隐患。网络技术越发达，组织的信息安全、个人的信息安全越是需要保护，但是在今天信息技术的条件下，我们也还没有做好周密的信息安全管理。所以，从建设、使用和管理这些视角来看，我们有成绩，也还确实有差距，就应该在这三个字——建、用、管三个字上面下工夫、花力气，使我们的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我在讲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的時候，讲建、用、管的时候，贯穿一个核心理念，反复在每一个里面所讲的就是树立起以学生为本、以学习为中心的理念，按照这样的教育教学理念来推进我们的信息化使用，信息化建设在学校工作中的作用今后将会显得越发巨大。既是生存条件，又是宝贵资源，也可能发展成学校有机体的神经系统，整个信息的传导都是在我们信息技术中间，它是学校有机的神经系统、神经中枢，依靠它建设起智慧校园。在智慧校园中，学生们智慧地进行学习，教师智慧地开展科学研究，学校的管理毫无疑问将会实行智慧化的管理，学校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也走向智慧化，很多工作方式都会发生重要变化。所以说，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应用天地广阔、前景远大，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一定能通过信息化大大地推进我们整个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成高等教育的强国。

（作者：瞿振元 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在线》，2016 年 6 月 16 日）



◎ 高教视点 ◎

大学办学院还是“学院办大学”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为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步伐，要统筹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方案制定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宏伟目标：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21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为实现这些目标，方案还就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任务、改革任务、支持措施和组织实施做了具体规定。

方案发布之后，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各高等学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认为吹响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冲锋号。刚刚出台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把“两个一流”建设纳入到教育现代化重大工程系列当中。在这两个政策文件的指引下，各地、各高校也正在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十三五规划的制定，进一步研究本地区本单位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师生活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具体措施。然而，从已经出台的一些区域性和部分高校的政策文件看，校院关系的调整与改革尚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校院关系影响了整个大学的办学活力

校院关系，指的是大学管理层与学院一级教学科研单位之间的组织关系。目前这个关系的现状是什么？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是大学办学院，而非学院办大学。展开一点说，在校院关系上，学校一级处于支配的、主导的和强势的地位，学院一级处于依附的、被支配的和弱势的地位。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学院领导班子的配备上，而且还体现在学院的专业设置、招生、人事招聘、职称晋升、课程与教学管理、科研组织、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资源配置等很多方面。

可以说，在大学内部的校院关系中，学院一级的自主权是非常小的。这一方面反映了目前高等教育法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本身的落实不到位，很多自主权也不在大学手里；另一方面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大学内部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大学和学院处于不同的行政序列，大学一般是厅局级，少数“985大学”是副部级，实体性二级学院都是处级，与大学的职能部门处在一个行政级别。大学对学院的管理基本上参照政府部门上级对下级的管理方式，各学院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领域的学科特性很少或很难被考虑，“标准化”“一刀切”“齐步走”的现象比较突出。

这种大学与学院的关系模式，极大地制约了学院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影响了



整个大学的办学活力。

从实际情况来说，学科建立在学院的平台上，学院是学科建设的主体，从而也是人才培养的主体、科学研究的主体、社会服务的主体、文化传承的主体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体。以人才培养为例，各个学科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是不一样的，适合学工的与适合学理的不同，适合学人文学科的与适合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也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样的学生最具发展潜能，应当是各个学院的教授们说了算，学院在招生工作中应该具有主导性的话语权。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大学招生是大学的招生办说了算，是招生办统一制定招生政策、统一进行招生宣传、统一组织录取。招生结束后，招办将录取的名单交给学院，招生工作就算结束。招办在分析招生质量时，主要就是从各专业招收新生的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及其历史变化来看，对于各专业特殊的素质要求不做太多分析。

与人才培养领域的情况类似，其他工作领域的校院关系也差不多，作为大学层面具体执行部门的大学各职能部处在工作中的行政主导非常强，不愿意或不能够深入地了解、考虑院系工作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具体情况，导致各项工作中的专业性比较薄弱。这就导致了大学及其职能部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担纲主要的角色，开会、调研、做规划、发文件、定指标、进行监督和评价等，忙得不亦乐乎。学院层面在大学的各项改革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未能得到切实的尊重与发挥，很多时候反而成了改革和发展的客体，担当执行、配合、服从、接受评价等角色。作为这样一种角色，学院在大学诸多改革中的自主权和话语权比较低，多数时候都是被当作改革的对象，对大学改革本身有一种恐惧感、疲劳感甚至厌恶感。在这种情形下，要想焕发出大学的活力，全面提升教学、科研、服务、文化传承及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质量，是非常困难的。借用两个时髦的词语，尽管近些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层出不穷，但是学院师生们的实际“尊严感”与“获得感”并不明显。

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必须调整校院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要建设好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必须借鉴国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经验，花大力气调整我国大学校院两级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学院在大学改革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牢固树立大学层面含职能部处层面的工作全心全意为学院改革和发展服务的思想，为切实实现“学院办大学”的理念创造积极条件。这是影响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应当在“十三五”期间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实际上，早在2011年，国家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出台的“国家试点学院”改革方案中，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倡导参与试点学院改革高校以学院为主体，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人才培养改革实验区。遗憾的是，这项改革方案在后来的几年中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为切实推进这种大学内部校院关系的调整与重构，建议：

第一，重启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先行去除大学内部的行政级别，不再使学院在行政上从属于大学层面，重新确立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主体地位；

第二，作为一种高校内部去行政化的替代性安排，学校职能部处管理系列岗位全面落实职级制，建立学院管理层岗位责任制，实行岗位津贴制，试点全职院长制度；



第三，切实转变学校内部管理方式，合并工作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管理部门，进一步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加大对大学部处机关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切实提高他们工作中的专业化、国际化和信息化水平，强化和提升服务学院工作的职能；

第四，将政府已经下放给大学的自主权进一步下放给学院，防止和解决中间截留的问题，在招生、专业设置、人才招聘、职称晋升、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学院的自主权；

第五，完善学院内部治理体系，加强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学术委员会、二级教代会、院系学生会、第三方咨询或评价等制度建设，确保已经下放的各项自主权能够规范、公正、有效和阳光地运行，切实增强学院办学活力。

总的来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不断地调整大学外部和内部的关系，尤其是大学内部的校院关系，充分发挥学院在大学发展、学科建设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真正实现学院办大学的理想。毕竟，没有一流的学院，就难有一流的大学。

（作者：石中英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5月10日）

双一流：地方高校不应“置身事外”

随着国家颁布“双一流”建设方案，各省市纷纷出台未来五至十年的学科发展规划，以期培育出一大批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一流学科或一流院校。从当前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来看，大多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的学科排名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科评估为主要依据，着重对高水平科研成果（主要是在国外SCI/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其科学计量学指标的数据表现）进行考察。

据统计，当前中国进入ESI排名前1%的学科大致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约80%的学科来源于部属高校，20%来源于地方高校；第二，即使地方高校的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也大多排名靠后，有的甚至在1%线左右波动；第三，所有的“985工程”大学均有至少一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而95%的地方高校没有一个学科能够进入。

因此，在创设“双一流”的进程中，热热闹闹的似乎都是部属高校。综合型的“985工程”大学以众多的优势学科为支撑，势要问鼎世界一流大学，单科型的“211工程”大学以特色的优势学科为依托，将优势拓展至关联学科，力图追赶部分“985工程”大学。相较于部属高校的踌躇满志，大部分地方高校似乎有些信心不足，迎头赶上不太乐观，原地踏步却唯恐落后。创设“双一流”似乎只是部属高校的“军备赛”，与众多地方高校关联不大。

我们认为，创设“双一流”，地方高校不应“置身事外”“隔岸观火”，而应该充分挖掘自身优势、洞察机遇，密切依据院校的传统与特色制定对接“双一流”的学科规划方案。从“双一流”建设的



基本逻辑来看,若干一流的学科群形成一流大学,而若干关联的一流学科形成一流学科群。因此,地方高校创设“双一流”的出发点应聚焦于学科。

扶持主导学科:基础的、支撑的、品牌的

扶持主导学科是地方院校的立校之本。主导学科是学校赖以发展的基础性学科,在学校的改革、发展中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提供强大的内驱力。无论一所地方高校是否有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或教育部学科评估前十名,它都应该具有至少一个主导学科。这门学科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学校在自身传统和社会需求的博弈之间积淀形成。

地方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应该密切立足主导学科的建设,通过修炼“内功”,夯实主导学科实力,积极建设一支老、中、青年教师传帮带扶、干劲十足的师资队伍,推动教学科研相结合,多管齐下,同时提升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成为学校发展的“顶梁柱”,以自身发展带动、支撑其他学科发展,从而形成院校、区域乃至全国独特的品牌学科。

以地方高校中的师范院校为例,其教育学科可能暂时未能在国内外的学科评估中有较高的显示度。但若能够审时度势,依据社会需求制定科学规划,持续改进加强自身实力,带动教育学科领域的农村教育、幼儿教育或特殊教育等学科发展,支撑体育以及艺术教育等学科的发展,那么其教育学科可能成为“区域一流院校”的支撑学科、全国“领域一流”的品牌学科。

培育特色学科:民族的、国家的、世界的

培育特色学科是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特色学科往往是学校发展所高举的大旗,能够显著提高学校的辨识度。它可能是学校的支撑学科或支撑学科所派生的子学科,也可能是独立于支撑学科之外的新兴学科。

学科“特色”的培育往往与中国的地域特色、文化特色或社会发展特征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学科的发展是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旺和全世界的福祉。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ESI或教育部的一级学科评估的学科分类来对特色学科进行审视,因为特色往往体现在二级学科甚至某一具体领域,大而全的学科分类会抹杀学科特色。

对于位于特定地域的地方院校,应着力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学科专业。以西藏藏医学院为例,它依托藏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了藏医和藏药两大国家特色本科专业建设点,预防保健学、藏药方剂学、藏药药理学三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并构建藏医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形成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对于所处地域具有浓厚的文化特色的院校,应着力围绕文化特色“大做文章”。以位于“孔孟之乡”的曲阜师范大学为例,它围绕“孔子研究”,成立孔子文化研究院以及孔子与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一系列科研活动,如“苏格拉底相遇孔子”中国—希腊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在国内外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虽然曲阜师范大学的支撑学科——应用数学在国内外也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但相较而言“孔子研究”却成为其更为靓丽的名片。

对于自身学科具有深厚的办学基础且社会具有强烈需求的院校,应进一步优化办学特色,提高社会美誉度。例如于1927年3月由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现南京晓庄学院,



拥有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2个国家“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为社会培养输送了10多万名基础教育师资，其中涌现出数百名中小学特级教师和教学名师，被誉为“中小学教师的摇篮”。

拓展应用学科：实用的、服务的、贡献的

拓展应用学科，主动服务于区域发展需求，是地方高校创设“双一流”的必由之路。虽然早在上个世纪，著名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大声疾呼：“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一些社会所需要的东西(needs)，而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东西(wants)。”但事实上，当前很多大学过度地追求了“社会所需”忽视了“社会所要”。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只有通过保持较好的多样性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各式各样的社会需求，也只有社会需求得到满足时，社会才能给予教育系统更多的支持。因此，虽然弗莱克斯纳之音值得警醒，但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所涌现的机构，如美国的州立大学、英国的“新大学”及德国、芬兰的应用科技大学显然证明了这一道理。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更是如此，只有扎根吾土、服务吾民，才能使学科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我们认为，评价应用学科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在于是否能够产出实用的人力、智力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需求，从而为区域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因此，地方院校在规划自身学科发展时，应着重考虑是否按照区域经济社会需求来设置、发展应用学科，是否能够提高完成当地企事业单位委托课题的研究能力，是否能够推广更有市场前景的专利转化等。“把研究做在大地上，把成果送进百姓家”是创设“双一流”进程中地方高校的必然抉择。

(作者：黄俭，王传毅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9日)

培养“高情感”的大学生

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

自大学产生以来，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都会有人从多方面反思大学的人才培养。2012年，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写了一篇《精英教育的劣势》(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的文章；2014年，德雷谢维奇教授又出版了《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一书，该著作一经问世，就迅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似乎令人难以接受的判断，作者认为：“当前的美国精英教育已经陷入了误区，这套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读罢该书，不由令人想起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讲的一段话：“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



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时这段话在国内引发热议。近期，我国有不少学者将钱理群教授提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德雷谢维奇在书中提及的“常青藤的绵羊”联系在一起讨论，或产生共鸣，或存有分歧，或支持，或反对，将该话题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实际上，在大学培养人的问题上，关于此类的反思乃至“批判”很多，例如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60多年前所讲的“半面人”。1948年，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讲座，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质疑。当时，梁先生是从大学文理分家导致人的片面化谈起的，他提倡教育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梁先生的观察，以及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言及的“两个集团”等论述，都是中外学者对大学人才培养的反思与“批判”。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不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在中外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被持续讨论的话题，类似的表述也非常多。

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

爱因斯坦曾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具备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时至今日，大学中出现“驯服的绵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何培养“高情感的”大学生，仍是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难题。1995年3月，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成员在东京地铁站投放“沙林”毒气，造成5000多人受伤，15人死亡，震惊了世界。后来警方调查，在奥姆真理教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大学生。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反科学、反社会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熄灭。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世界未来学家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提出：“高科技时代需要高情感的人。”

我们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之所以会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与热议，无外乎大家对当下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与矛盾有质疑，长期积压在人们心中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与不满，在遇到这样一个话题之后得到了一个释放。但是，仅仅一味地观望、呼吁或是抱怨，都是远远不够的，在对待该问题上，要理性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并需要对我们当下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进行一个清晰的、符合时代需求以及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和界定。

如果将“驯服的绵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理解为世故老道、善于利用体制谋一己私利而将自己置身于国家命运与人类幸福之外，那么显然这样的人是不完整的，是缺乏基本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怀的。不得不承认，当下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浮躁以及大学内部存在的各种庸俗化现象，使得一些学生急功近利，缺乏自身理想和目标，导致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认为，“驯服的绵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是大学生中的主流，尽管如此，我们对此现象仍然需要多加关注，在学生的价值观上积极引导，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操守，而且还要培养其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重新界定人才培养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进行抨击的同时，还有一些人作为回应而呼唤



大学的另一种“回归”，即开始憧憬象牙塔式的中世纪大学，向往纽曼的绅士大学，怀念洪堡的柏林大学，仰慕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进而生发出一种对大学的念旧情怀。但是事实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已经冲破了理想中古典大学的边界，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功能以及高等教育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在牛津大学演讲时所说：“大学像其他如社会、政府、慈善等人类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今日人们在面对高等教育中产生的问题时怀念过往，殊不知，理想中的古典大学已经是落日余晖，今天的大学已很难再回到古典大学时代。

在我国高等教育早已突破精英化，并正在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对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认识和界定。今天，我们的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关于这个问题，或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当代大学至少应该培养具备以下素养的人才：具有高尚道德操守的人才，具有社会担当和责任的人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以及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系厦门大学副校长）

（作者：邬大光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5月17日）

大学有中国模式之说吗？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飞速扩张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8～2010年，入学率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精英学校计划中投资巨大，以期将一些学校 and 项目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一举动引发了全世界努力建造世界级大学的竞争。中国目前在高等教育扩张上的成功引起了一些探讨和争论，主题是关于大学是否存在新兴的中国模式。这篇短文对这一主题的一些深入调查进行了概述。

辨别中国模式的两大方法

两大方法正在成为探索中国模式的基础：历史文化法和社会政治法。前者将议题嵌入儒家知识传统。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知识传统体现了历久弥坚的思考模式或文化自觉的突出特点，这必将作用于既定社会发展形态的建构之中。所以，中国大学确实有着儒家学术传统。尽管大学被植入中国的土壤仅大约一个世纪，但作为学习型组织，人们很自然地将其与统治中国教育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学民族精神联系起来。沿袭传统路线，自由教育的概念目前是根治中国大学衰落的一剂良药。自由教育与儒家知识传统相联系，强调人本教育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向历史学习，而非借鉴西方模式。为了和西方概念相区别，这种实践有一个中文名字——通识教育。历史上，中国曾经历比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更深刻的人文主义教育。因此，过去十年见证了中国大学日益鼓励实行自由教育并整编和扩展课程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中国大学的自由教育组织把自己称为“书院”（唐宋时期盛行的进行古典学习的私立学校），并有意将自己与儒家传统联系起来。

历史文化法主要利用“理想类型”（the ideal type）的概念。理想类型通常是通过基本的概念和定义分析历史独特架构的有用工具。然而，也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大学用 100 多年的时间尝试了各种西方和苏联模式并吸收了它们的影响，所以很难获得从儒家传统的特色和元素中塑造出来理想类型。然而，即便得以恢复，书院也已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失去了它的文化氛围。所以，研究表明当前环境中的通识教育只能带来表面的影响，是建立在与政治目的相关的功利主义方法上的，是为了创造“世界一流”大学或进行特定目的的品牌营销，这一点不足为奇。就其本身而言，通识教育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式大于实质的问题，它无法给学生带来学习体验的重大转变。

而当代社会政治法则认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或“北京共识”）构建了中国大学所运行的规范环境，明示了国家的核心角色，强调了效率对加快经济增长的意义。这个模型绝对可以在中国大学中得到阐述，它在资源的有效流动和短时间内极大扩张及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方面发挥了优势。因此，从推动入学率的快速增长、建立新的管理结构，同时力图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角度看来，中国体系非常引人注目。中国大学的这些鲜明特征都反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计划与冲劲。在扩张的高峰年份，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在 1998 ~ 2006 年间的年均增速为 17.4%。2012 年，中国前 50 所研究型大学名义上研究收入平均约为两亿美元，远超过 2000 年清华大学七千万美元的当年最高收入。所以，中国大学目前授予了全世界理工科将近四分之一（24%）的学位，这对知识经济来说意义重大。在 2001 ~ 2011 年间，中国在理工类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章中所占比例从 3% 上升到了 11%，增长了将近四倍，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理工科文章产出国（仅次于美国），并且在排名前 1% 的文章中，中国所占比例在这期间翻了六番。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大步前进，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这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当代社会政治法采用开放系统理论。开放系统理论学家认为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居于“超系统”（suprasystem）内的系统，这个超系统是由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所组成的。这个开放的系统拥有着各个环境之间的互动，通过这些互动大学开始接受特定的价值观、适应该环境中重要的结构和过程。然而，“北京共识”背后基于实践的推论则强调和追求切实的利益，这造成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界的盛行。此外，整体的按部就班主义（最好的阐述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能阻碍了监管环境制度化的重要努力。因此，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大学在决定其内部事务时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以它们的表现和责任作为交换）；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它认为需要的时候可能会随时加大对这些大学的控制。

两种方法在方法论上的局限

尽管历史文化法有很多优点，但也有缺陷，即缺乏一个连接传统和现代元素的中国模式完整情境化过程，虽然这个方法确实是受情境约束的。更确切地说，它在当前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的转型社会中遭遇挫折。历史文化学家如是说，中国大学当前所处的环境与传统大有不同，而且一个纯粹的传统环境几乎不可能重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将会影响巩固历史文化言论的传统决定论的有效性。



当代社会政治法的优点是将中国模式的论述放到当今现实生活条件下，这一做法会提供一个有用的方法将众多社会、政治和经济要素纳入分析中去。更明确地说，它准确地将中国经验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是中国环境下独一无二的经验。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经验就很难证明中国模式的存在了，因为一种模式需要启发并推动其他国家的进步。

结 语

上述两种方法都强调了中国例外论，不管是反映传统文化环境还是当今社会政治模式。这又造成了学者对此现象的调查驻足不前，转向诸如此类的两分法：儒家传统 vs. 现代价值论；中国特色 vs. 世界文化。我们相信，树立儒家传统，站在现代价值观的对立面，可能会忽略传统历久弥坚的模式以及文化交流的鲜明特色。事实上，当代儒家言论本身就是组成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大学运行和国家政治目标之间的紧密结合同样可以与西方大学合法化的一个主要理念联系起来：高等教育的政治理念——证明大学的合法性缘于其对政治体的深远意义。因此我们建议，可以将这一探讨放到更广大的全球环境中去，并由此开启一扇门，去观察和发现 19 世纪以来甚至更早开始的中国元素和西方高等教育体制之间的互动（演进）。从那里出发，我们才有理由提出一种潜在的中国大学模式。这种模式源自儒家传统元素以及西方模式的创造性的有机嫁接，同时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环境。换种说法，大学新兴的中国模式毫无疑问是中国环境特有的，但是与其他体制或模式具有相似特征，这种方法或许阐明了这样一个概念：正是这种不同特征（儒家和西方模式）间的结合铸就了中国模式的独一无二。不过，中国模式究竟是全球模式的一个变体还是替代物，这仍然是个问题。

（作者：查强，史静寰，王晓阳 来源：《国际高等教育》，2015 年第 3 期）

学生评教，我们该如何看待

近日，南开大学推出的校友评教系统令人耳目一新。有评论将校友评教视为现有学生评教的有益补充——要知道，就在上个期末季，还有不少关于“学生评教是否形同虚设”的讨论。

学生评教制度于上世纪 20 年代起源于美国大学，上世纪 80 年代后，我国高校开始逐渐采用，已经成为高校评教制度中的重要部分，也遭到不少抱怨。

关于学生评教，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它？

学生：我的评价准确吗

学生评教看似只是学生填写的一份问卷，有人质疑它的有效性，例如，问卷能否评价这么多不同学科的课程及教师？学生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对教师的教学作出评价？学生在评价时是否会因为主观因素给出并不真实的评价？



首先，在学生评教的制度设计中，学生的评教行为是匿名的，也均在期末考之前进行，因此，学生不必担心给教师打分低了影响期末成绩。关于这一点，就读于北京某“985工程”高校的研究生小黄表示满意。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填写评教问卷时，自己有时会疑惑。

“比如，问卷让我们评价老师教学的创新程度，可能学生并没有足够的判断资格。”小黄说。

他还说：“评课时当然有友情分，应该说感情因素和客观评价各占一半吧。”在他看来，当学生对老师印象好时，“会不自觉地打分偏高”。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向记者补充，高校课程评估指标不能长期一成不变，也不能采用同样的指标体系“一刀切”地评价所有课程类型。以北京大学本科课程评估为例，历经20余年不断的研究和改进，目前针对理论课、实验课、体育课都有不同的评估网络问卷，也发展出专项助教评估问卷。“评估指标需要动态调整，一般五年就需要作一次微调。”

关于学生反映问卷上的某些问题令学生不太确定，卢晓东则表示：“我们并不需要专门给学生做评估方面的辅导和报告，就实践经验而言，评教数据统计的信度和效度都在合理范围之内。”

作为老师，三峡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詹丽向记者表示：“总体而言，学生评教是能够反映出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付出的努力程度的。”

教师：学生评教是否带来过大压力

近年来，某些高校教师为了评教的高分而刻意讨好学生的事情时有发生。

“现实中，肯定有在评分的压力下而刻意讨好学生的教师，但绝对是极少数。”詹丽说。

“教育评估的制度设计一定要避免学生因为考试短期情绪而影响对课程和教师的评价”。卢晓东说，学生评教填表的时间需要安排在考试之前，参加考试后就不能再填写评估问卷了。卢晓东不认为教师应该通过放低学术要求而讨好学生，北大有一些非常严格但上课认真投入的老师，他们的课程评估成绩并不低。

评估给教师带来一定的压力，是有些高校基于学生评教得出的分数而对教师的薪酬有所影响。具体是指在教学评价中排在最后10%的老师，其薪酬会受到一定影响。

例如，在三峡大学，评教结果排在后10%的教师，所上课程的酬金计算会打折扣发放。詹丽表示，经济方面的影响倒不见得是老师们最关心的，“可能主要还在于精神上的压力”。

卢晓东认为，课程评估结果应给任课教师带来适度压力，给予教师机会反思教学，改进教学。“研究表明，如果教师群体足够大，那么教学评价结果中居于前10%和后10%的教师在教学方面的表现的确有差异。”

他解释道：“教学评价是教师在很多学生那里综合得到的评价，如果有一两个学生的偏见评价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学生们普遍反映某位教师教学不佳，其背后一定有原因，需要教师认真反思。”从这个角度来说，教学评估排在末位是对教师教学发出的一个清晰的改进信号，这样的信号需要得到教师本人和院长系主任充分的重视。这是课程评估重要的价值所在。

不过，詹丽表达了老师们对评估的不解。

“近年来，我和同事们普遍感到，我们从教务部门得到的评价分数普遍在上升，可以视为教学进步的表现。但目前制度使得即使所有教师都在进步，也一定有人受惩罚，这合理吗？”



价值与更有价值

据了解，目前高校评教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但最重要的是学生评教。

以三峡大学为例，詹丽介绍道，该校的评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学生评教，主体为课堂上的学生；二是专家评教，主体为专门的教学督导；三是同行（一般是同事）评教。

“教学督导的评课多通过课堂抽查完成，次数有限；同行乃至同事的评价在人情社会中未尽客观；相比之下，只有学生评教的覆盖范围最广，也相对客观。”詹丽说。

值得一提的是，教学督导的评价在詹丽看来较为权威可信，因为他们经验丰富，有足够的判断力评教。“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为陈旧的知识背景可能同时共存，这可能是教学督导评教的局限。”卢晓东提醒道。

詹丽表示，学生评教令教师有机会更好地改进教学方法，这是作为教师的她非常重视的反馈。而记者同时也了解到，在某些尚未全面推进问卷调查评教的院校，教师们也会定期通过座谈会的形式询问学生对课堂的看法、意见。

应该说，与传统的座谈、沟通相比，如今，学生评教大范围的数字化调查问卷，其意义已绝不仅在师生沟通这一层面，基于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是令教育研究者们更兴奋的事情。

卢晓东介绍，近来开始在国内高校推行的小班教学，其教学效果得到了课程评估大数据的支持，其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我们发现，班级规模是影响学生课程评估优异指数的重要原因。班级规模越小，师生间的互动越多，课程体验更好。”

“简单的课程评估平均分数不能够深入揭示分数背后所蕴涵的深层次问题。如何通过大学长期课程评估结果的大数据挖掘，分析课程教学效果差异的群体特征，提炼出对课程管理和教学改进的有效信息，进而为高校教学绩效评估提供参考，为教学改革指明方向，是大学课程评估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他说。

（作者：韩琨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6年5月12日）

